



当代名人故事丛书

# 名士风流

中国文人沧桑路

陈思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人故事丛书

# 名士 风流

中国文人沧桑路

陈 思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士风流:中国文人沧桑路/陈思编. —郑州:河南  
文艺出版社,2011.10

(当代名人故事丛书/崔向东主编)

ISBN 978-7-80765-547-3

I. ①名… II. ①陈… III. ①文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通俗读物 IV. ①K825.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178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mailto: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69 000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声明:本书有个别文章和图片未与作者联系上,请相关的版权所有者  
与本社联系。)

## 目录

### 深沉的讲述

- 002 我的四外公——老巴金 李舒
- 009 我和父亲吴祖光 吴霜
- 017 我的父亲沈从文 沈龙朱 刘宜庆
- 027 韦韬眼中的父亲——茅盾 刘守华
- 035 寻找外公陆定一 荒坪
- 049 我所知道的英若诚 吴霜

### 他们奋斗的身影

- 057 余华：从小镇牙医到先锋作家 洪治纲

- 068 张贤亮和他西部废墟上的“好莱坞” 罗网  
074 易中天:从平民学者到“大众情人” 梧桐  
081 阎连科:耙耧山脉走出的著名作家 梁鸿  
090 池莉:文学,我的梦只为你燃烧 黄晓环  
100 二月河的军旅人生 刘逢安  
106 作家石钟山的四栖生活 肖正  
114 叶大鹰:一个红三代的成长史 周海滨  
124 于丹:创造“神话”的“学术超女” 梧桐

### 他们鲜为人知的情感

- 133 金庸与夏梦的未了情 一鸣  
139 余光中:身边的女人都爱他 古远清  
146 梁实秋与冰心的友情 刘聪  
155 谢添:情感历程九十年 李霄凌

### 他们的老照片

- 164 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照 梅子  
166 魏巍与“烈士”们再续情缘 穆星言  
168 丰子恺和猫 梅子

# 深沉的讲述

## 我的四外公——老巴金

◎李舒



巴金先生是我外公的四弟，我以前一直称他四外公。记得“老巴金”最早是小棠（巴金先生的儿子）叫出来的，后来大家都这么叫了。巴金先生常说自己“又老又病”，但他又那么真诚、善良，一心为着别人，叫“巴老”或“先生”似乎都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1960年12月25日，老巴金那时住在成都，他在日记中写道：“八点一刻起。刚洗好脸，国莹带李舒、李彦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八岁，我弟弟李彦六岁。有趣的是，1961年1月15日，老巴金又写道：“八点醒，还未起身，李舒在外面推门。便下床开门，由他叠好铺盖。”看来，我真是勤快得要命。

再见面是在1975年了，我在上海实习，每个厂休日都去老巴金家。他在，我们就聊天；他不在，我就找本书看。我从小就没有见过外公和爷爷，在老巴金的身边，我觉得他是最亲近的老人，虽然当时他还是

“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再后来是1982年了，从这年起我就经常到上海看望老巴金并陪伴他住一些日子，也帮他做一些事。我喜欢在老巴金身边的那种恬静和超脱的感觉，喜欢在此状态下感受他人格的魅力。我乐意为他做点儿小事，和他说笑笑，让他感到多一个始终关心他、爱他的人。

老巴金是个很独立的人，他不依赖人，也从不麻烦人。但后来我们相处得很默契，同时，衰老和疾病使他不得不考虑找个助手。1990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总之，我需要人帮助，你和马绍弥对我更有用。”（马绍弥是马宗融和罗淑的儿子，也是老巴金的养子）于是，由中国作协发函借调，我在老巴金身边做了几年私人秘书的工作。时间长了，积累了不少照片和故事。

现在，我将下面的文字献给热爱老巴金的读者，作为对他的追思和怀念。

## 白发下燃烧的心

老巴金是一个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是他终身的信念。

自1949年以来，老巴金没有领取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他一直靠稿费生活。在1949年以前的十几年里，老巴金一直担任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不领取工资的。因此，他认为作家是由读者养活的，作家还要从读者那里汲取创作的养分，所以当然应该把心交给读者。

1936年，一位安徽的姑娘因为与后母相处不好，只身到杭州准备自杀。后来她改变主意，进了一个小庙修行，不料又被和尚纠缠。姑娘无奈，又不愿向家人求救，却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老巴金求助。当时好些朋友对这件事有疑惑，但老巴金还是约了鲁彦和靳以，专程赶赴杭州。他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老巴金不得不冒充姑娘的舅父，见到了她，替她付清了欠账，还替她买了到上海的车票，把她送到了真正的舅父家。那位船夫知晓全部内情，分别时很诚恳地说：“你们这些先生都是好人。”老巴金后来写道：“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

“文革”期间，老巴金受尽磨难。一天，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段消息：一个女青

年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默默地看他的小说《家》，周围的人发现了，要她把书当场烧毁，并参加对“毒草”的批判。当时报纸刊登这条消息的目的是要宣扬“文革”如何深入人心，但老巴金却十分激动：读者并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的作品！

1991年夏天，谭兴国先生专程从四川来到上海，看望八十七岁的老巴金。当时老巴金曾托他带回一个口信：在我九十岁的时候，一定回家乡看看。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老巴金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他期待着身体更好一点儿就回家乡去，他渴望着踏上家乡的泥土地，呼吸家乡的空气，沐浴家乡的阳光雨露。然而就在他九十岁生日前夕，病魔又一次击倒了这位真诚的老人：胸椎压缩性骨折、疝气、体位性低血压接踵而来，再加上十几年的痼疾帕金森氏症，使他不得不以医院为家。

到1996年，老巴金与病魔又抗争了一年半，他放不下手中的笔，他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巴金译文全集》的有关工作，写作了十篇《代跋》，还出版了一本新作选集《再思录》。实在动不了笔他就口述，看不了书报就请人念，他拖着病残之躯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决心让心中的火燃烧到生命的尽头。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生命才有意义，生命之树才会开花、结果。

那一年我在杭州陪老巴金。他每天早晨6点开始收听新闻广播，晚上则吸着氧气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临睡时他总要询问叮嘱一下：收音机放好了没有？电池有没有电？有时半夜两三点我被“沙沙沙”的电波声惊醒时，就知道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连翻身也动不了的老人又惦着什么事了。确实，老巴金牵挂的事太多了，那两年他最关心的是灾区和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他为帮助灾区和希望工程默默地做了一些工作，但总有一个条件：不要宣传、报道。

老巴金曾经说过自己不是文学家，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学技巧，是有感情要倾吐，才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可是他非常珍视“作家”这个称号，他认为作家是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的同行，作家从事的是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同样的职业，每一个作家都应当为此骄傲、以此自豪。

当老巴金知道我要为四川的《作家文汇报》写文介绍他的情况时，他非常吃力地对我说：你要写我生病，不能写字，走不了路，说话也没有力气……我不让他再说下去，我知道他在为不能回家乡而歉疚，而遗憾。但家乡和人民时时刻刻都

在他的心中,为他所思念和牵挂。

文章写好了,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又讲了一段话,让我记下附在文后:“我经常半夜醒来,想起几十年来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给他们的太少了!我的作品不足以报答我的读者,我还要多做些事,用行动来答谢读者。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老巴金说,他与读者唯一的联系,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当他无法用作品报答读者时,就用行动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老巴金就通知相关的出版社,将他的稿费直接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除此之外,他还向希望工程、灾区、文学基金会等捐献了大量的稿费。我在成都替他领过三次稿费,有两次是立即捐给了四川的希望工程,一次是带到上海去捐的。2003年上海办了一个老巴金的展览,我看见捐赠证书就摆了满满一柜。

老巴金患帕金森氏症有二十多年了,写字非常艰难。笔似乎重逾千斤,有时手动不了,握着笔在纸上不停地抖,急得他用左手去拉扯右手。有一年我去杭州看老巴金,他很高兴,让我替他想想办法。我看见一些废稿,写的都是“希望小学”。因为手发颤,字写得不好,他不好意思送给孩子们。他一生写作和翻译了上千万字,没想到最后被四个字难住了。他想写得端正,写得有力,因为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那是“孩子——希望”!

我保存了一张废稿,和老巴金的全集放在一起。

## 信仰

年轻时的老巴金常说:“我不怕!我有信仰!”的确,信仰是他人生旅途的支撑。但到了1957年,老巴金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删去了旧作里的两行字: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他承认思想是会变化的,收回了年轻时的“大话”。

那么,老巴金的信仰是什么,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他多次说,自己的信仰由三部分组成: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老巴金是坚定的爱国者。著名学者季羨林在《牛棚杂记》中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时,说:“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

人道主义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之前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要加上“革命的”三个字方能使用。这是很荒谬的东西,实质上根本没有人道主义的内涵,而是歪曲了“人道主义”的本义。

1966年,老巴金在上海作协受批判。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外地的初中学生,他不知道老巴金是谁,只认定这是一个“坏人”。于是他逼着老巴金带他到家里去,老巴金当然不敢,那个外地学生就追着抽打老巴金,逼得老巴金四处躲藏。最后那个学生还恶狠狠地说:“对这些坏人就是不能讲人道!”

老巴金把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斥为“兽道主义”。

无政府主义就麻烦得多了,它不仅是贬义词,一段时间里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同义语。

我觉得老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可能和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在六七岁时,老巴金的父亲在四川广元做县官,他看过父亲审案、动刑。其实还不是酷刑,只是“打板子”、“跪抬盒”之类,但老巴金后来说:“这两年的经历使我终身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反强权、反压迫。

在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传播很广,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都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的。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老巴金,他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老巴金回答:“是啊。”

后来在“文革”中,在要不要给老巴金戴上“反革命”帽子时,据说毛泽东讲了一句话: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潮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老巴金的信仰:

许粤华1989年从美国到上海,来华东医院看望老巴金。她是老巴金的朋友,还是他的一位老朋友黄源的前妻,又是他另一位老朋友黎烈文的夫人。黄源和黎烈文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许粤华也编过刊物,从事过翻译工作。

1936年鲁迅去世,许粤华和黄源是最早赶到鲁迅遗体前的人。老巴金和他们一起参加了鲁迅的治丧事宜。她现在是一位虔诚的教徒。

老朋友重逢,气氛非常热烈,许粤华的几个子女也在场。当时除了聊天、谈往事之外,许粤华还很想说服老巴金皈依到“主”的脚下。她恳切地说:老朋友,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是还缺一样,你没有主;有了主,一切就都完美了……老巴金始终笑着,可并没答应。

后来老巴金给许粤华去信,他说:“我尊敬你,因此我也尊敬你的信仰。我愿意受苦,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谁赐给我幸福。事实上这幸福靠要求是得不到的。正相反,我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

最后他说:“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

## 龙归大海

2005年10月17日,老巴金病逝于上海。

老巴金的去世,给热爱他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中国现代文学馆连夜布置了灵堂,接受社会各界的追思与悼念。众多的花篮在文学馆里一直陪伴着老巴金的遗像。

我在武康路见到了退休的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她说听到老巴金去世的消息后,一进家门就泪流满面。

我还多次见到新华社的另一位记者赵兰英,她和郭玲春一样,从记者成为老巴金的朋友。赵兰英是有任务的,她必须在悲痛中完成自己的报道。在告别仪式结束后,我看见她走在最后,心脏病发作了,她用颤抖的手掏出急救药片。第二天我打电话询问其病情,她又远在嘉兴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采访现场了。

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发来了祭文,在10月23日守灵那天是由我在老巴金身边代读的。祭文里年逾九十的马老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要坚决讲真话,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还见到了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的唁函。邓朴方多年前和老巴金就人道主义有过一次探讨,通过探讨他们相知、相重。邓朴方在唁函里直率地说:“巴金先

生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坛巨匠,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人道主义积极的倡导者。”“巴金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

悲痛笼罩着所有热爱老巴金的人。

我看到已经年迈的张弘的悲伤。她年轻时读了老巴金的作品,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这位新四军老战士每年都要送一盆水仙来,献给她生命中的引路人。

我看到老巴金的侄子陈济爆发的悲痛。陈济以前是警官,也是一条硬汉。平时陈济只是默默流泪,可是在火化场,他的悲痛爆发了,他和马绍弥相拥着痛哭。

我还看到许多青年读者,他们献上一束鲜花或一首挽诗,转身默默离去,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不知道,这样的鲜花和挽诗给哀痛中的老巴金的亲人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安慰和温暖!

老巴金的儿子小棠只流泪,不出声,在冷峻中压抑着极深的痛;女儿小林的哭喊让我们所有的人心里发疼,欲忍不止。但在他们的悲痛里有着坚定: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

老巴金的遗愿里有一条,就是和萧珊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向大海。

大海在等待,等待龙的归来。

## 我和父亲吴祖光

◎吴霜



吴祖光(1917—2003),20世纪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曾在香港电影界任编导,是香港文化界和电影界的先导。曾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代表作有《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花为媒》、《三打陶三春》和《吴祖光选集》六卷本等。

吴霜,吴祖光的女儿。1957年10月24日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声乐专业硕士学位。后归国。1999年,由她策划并撰稿的电视专题片《新风霞》获“中国电视星光奖最佳纪录片奖”;2003年,她创作的话剧《别为你的相貌发愁》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现任北京蓝气球文化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艺术总监,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演出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回忆过去是一种强烈的享受。“过去”是一瓶陈年的葡萄酒，被人有意地存放在黑漆漆的地窖里面，为的是有一天取出来品尝享用。

我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多是回想小时候的家，我总是在梦中回到那个家里。那种亲切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伴随着亲切的感觉还有深深的遗憾甚至悲哀。人若是可以停留在永远的孩童时代该是多么的美妙啊！

我是一个北京孩子，自幼生长在北京。我小时候的家就像是一张画，画里的每根线条我至今耳熟能详。那是北京的一座传统的四合院，地处东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后的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面。胡同的名字叫“马家庙”，想来准是哪年哪月有个姓马的什么人家在这里造过一个家庙，不过印象当中我不记得这座庙到底在哪儿，可能早已在某个朝代某个时期被毁坏了，但是“马家庙”这个名字被一直保留了下来。

那条胡同窄窄的，但是胡同里的人家却不少。我家的大门显得比其他人家的门大一些也宽一些。门前有两级台阶，踏上台阶推开一扇宽宽的大红门，会看到一条长长的洋灰甬道、二道门和青砖月亮门洞，然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有丁香、榕花树、杨树、海棠和葡萄架，那就是我幼年时候的家。小时候，我觉得这个院子大极了。丁香、榕花枝繁叶茂，海棠和杨树长得比房顶高出许多，葡萄架下可以喝茶乘凉。院子里花多，到花开时节，缤纷的花色伴随着蜂围蝶绕，十分的热闹。那时节最常看到的是一个倒背着双手徘徊在洁白丁香和粉红色海棠花之间的人影，那就是我亲爱的父亲吴祖光先生。

妈妈说，我是在全家搬到这所院子之后出生的。我父亲身处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承担起了全家人的经济负担，他用写作赚来的稿费、演出版税支付家庭中的一切开支。父亲是一个十分有责任心的长子和大哥，但是与此同时他身上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却是他一贯的不善家务。这个特点在许多年中一直没有改变，可能是父亲决意不再在他所不擅长的领域里做任何无谓的努力了。但是在我出生的那年，却出现了例外，父亲开始带孩子了。

我出生的那一天是农历的重阳节，日历上还标明：霜降。于是父亲用“霜”字为我命名。“吴霜”谐音无双，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名字一直为我带来运气。父亲十分宠爱我这个早产了两个多月的小女儿，他开始亲手带孩子，给我洗澡，喂

我吃饭,抱着我玩儿。如果我和爸爸妈妈睡觉,我总是睡在爸爸一边。在我眼里我的父亲不只是一个父亲,他更是一个非常耐心、幽默并且善解人意的朋友。

不过我对父亲真正产生记忆是在我大约四岁的时候,那是他在当年的“反右运动”里成了有名的“右派”,被惩罚到千里之遥的有“北大荒”之称的东北劳动了三年以后的事。那时的我在第一时间里就认出了他,妈妈指着父亲问我:他是谁?我愣了一下,当即笑了:他是爸爸!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父亲的心肝宝贝、牛皮糖、捣蛋鬼,死活粘在他身上再也下不来了。

当我大到可以向父亲提问题的时候,我们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爸爸,妈妈生我的时候你在干吗?”

“我好像是在家里睡觉。”

“那你不知道妈妈在生小孩吗?”

“不是很清楚。”

“那后来谁告诉你有了我呢?”

“当然是电话喽。”

“电话说什么了?”

“他说你有了一个女儿,一头小卷毛儿。”

“那你呢?”

“我一高兴就跳起来了,脑袋就撞到天花板上磕了一个大包!”

爸爸的头上到底磕出了大包没有,这是无法考证的事,不过父亲最喜欢我这个小女儿可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父亲是个极喜欢结交朋友的人。他善言辞,生性乐观,出手大方,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父亲的家庭属于书香世家,讲究知书达理,文化气息浓厚。生活虽不属大富,却也从未贫寒过。因此父亲在开始用写文章写剧本的稿费赚钱之后,便再没有受过拮据之苦。以我的观察,父亲平生最觉开心的乐事是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他的各种朋友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其中有些人家境清贫,父亲总会给他们钱,他经常戏称自己是“散财童子”。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语叫做“适可而止”,在这个词语面前没有好事坏事之分。我记得一件乐事,很能说明父亲的性格。那时有一位叔叔,好像是在房管所工作的干部。因为我父母买房搬家认识之后变成了好友常客,经常到我家来。他家里似乎有不少子女,我妈妈常

把一些衣物鞋袜积攒起来送给他带走，而父亲则经常拿钱给这位叔叔用。后来，这位叔叔用父亲的钱从不好意思变成了一种习惯，常见他走进门来找到父亲说：“祖光，有钱吗？给二十。”父亲便会给他二十。“祖光，有三十吗？”父亲就再给他三十。习惯成了自然，便一点儿没有了矜持和不安，想来就来想要就要，父亲的裤兜成了最方便的银行。直到有一天，父亲烦了。

那位叔叔说：“祖光，我想用点儿钱，有吗？”父亲说：“不行了，今天没有。”叔叔不响了，他的表情显然是不开心的。我不知道那是由于一种突然遇到不曾预料到的拒绝后的恼怒，还是猛然感到了早就应该意识到的羞愧因而无地自容，总之这位叔叔从此和父亲断交了，他再也没有来过。父亲后来给我讲起这件事，也有些不置可否，他不想埋怨那个人，也不觉得自己有何不对。而我很直白，我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极了。”

父亲当然有许多十分可爱的朋友，要比“讨厌”的朋友多得多。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来的次数多了，我和他们都十分熟悉。父亲出门也喜欢带着我，他带我去过许多地方，看朋友、看电影、看戏、串门、买书、下餐馆，经常是骑着他的那辆从香港带回来的英国罕巴牌自行车，把我放在前面的车梁上。小时候我是很捣蛋的，有时候也会把他缠得不耐烦。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出去看望老朋友黄苗子伯伯，我很喜欢黄伯伯，他对我的态度是总不把我当小孩儿，而是一本正经地和我谈话讨论问题。我非要和父亲一起去看望黄伯伯，可父亲说今天不是玩儿不能带我去。我于是开始纠缠不清，吵闹不休，一个人顾自穿上了大衣，戴好了围巾，一切准备好等待和他一起出门的样子。父亲算计着如何能够摆脱我的纠缠，他趁我不注意几步溜到了房门口，想甩掉我悄悄溜走了事，谁知却早已经被我发现。我大喊着：我看见了！不带我去我是坚决不干的！他实在有点儿不能忍受了，回过身瞪着我，突然间伸出双手就把我举起来，向门旁边的大沙发里猛力地一摔，摔得我晕头转向。父亲对我的这种举动在我记忆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还了得！这是屈辱！我岂能屈服？我只觉义愤填膺，于是我晃着脑袋甩开眼前冒出的一串串金星，一下子从沙发里弹了出去，就像一颗小炮弹，我奔过去猛然抱住了他的腿，毫无准备之下他下意识地一挣，只听得“扑通、乒乓”一阵乱响，我们一大一小两个人同时就摔到了门槛上。我开始大哭，然而更加可气的是，父亲和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妈妈却大笑起来。我的气愤直线上升之时父亲的怒火却